

# 媒介·文艺·社会：副刊属性再探析

郭 静

**摘 要：**副刊作为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刊载文艺性作品为主要内容。它融报学形态和文学形态于一体，既拥有新闻传播媒介所特有的新闻性、思想性、时代性等特征，也具有文艺作品所蕴含的文学性、知识性、审美性等特征。与此同时，副刊也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记录着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状，是深深嵌入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互融合与渗透。把握好报纸副刊所具有的媒介、文学和社会等多重属性，是保持副刊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副刊；属性；媒介；文艺；社会

**作者简介：**郭静，女，讲师，博士。（合肥学院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9）06-0055-06

副刊是相对于报纸正刊而言的。报纸的正刊一般是新闻和言论版，而副刊一般是正刊之外延伸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文艺性版面。副刊是近代文明的产物。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中主张“副张之材料，必以文艺为基础，如批评、小说、诗歌、戏曲与新闻之类。凡足以引起研究之兴味者，均可兼收并蓄，而要在与日常生活有关，与读者之常识相去不远。”<sup>[1]</sup>强调副刊文艺性的同时，也关注副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副刊作为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刊载文艺性作品为主要内容。它融报学形态和文学形态于一体，既拥有新闻传播媒介所特有的新闻性、思想性等特征，也具有文艺作品所蕴含的文学性、知识性、审美性等特征。与此同时，副刊也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记录着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状，是社会文化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互融合与渗透。因此，副刊所具有的媒介、文学和社会等多重属性是其独有的文化内涵，也是保持其长久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一、副刊的媒介属性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sup>[2]</sup>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技术作为物质文化的一种，其发展变迁与精神文化始终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例如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大量的机械复制成为可能，报纸作为印刷文化时代最重要的传播媒介，能够在短期内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引起社会思想文化变革、价值观的改变以及文明的演进。副刊作为承载着中国文化思潮变迁以及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成为报纸的稳定组成部分，从最开始的随报附送到最后在报纸上有独立的版面或专栏，都与副刊所依附的报纸的诸多传播媒介属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报纸出版周期短，频度高，时效性强，提高了副刊的传播效率。在近代报刊出现以前，用来传播信息的多是线装书、小册子等，如早期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丛报》等，基本上是月刊，发行时间较长。日报报纸的出现大大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频度及传播的时效性，

且有固定的出版时间。副刊依附于报纸而存在,而报纸迅速、快捷、携带方便的传播特征大大提高了副刊传播的效率。与此同时,报纸强时效性以及固定出版时间使副刊作品尤其是连载文章能够长期出版,故事的悬念等也容易吸引读者,有利于形成固定的读者群。

其次,报纸定价低,发行量大,扩大了副刊的受众面和传播范围。《申报》的创办打破了《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也创下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报纸的辉煌。《申报》当时能够战胜《上海新报》不仅在于其创刊之初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确立了“新闻、评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还有一重要因素是其大幅度降低了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一方面报纸的低价位和大信息量使得报纸的销量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报纸副刊所富含的丰富的文艺性、休闲性、趣味性等特征,扩大了报纸的传播范围和受众面,使得副刊内容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反过来推动了报纸的发展。

第三,报纸易保存,便于携带与传播,提高了副刊的重复阅读率。伊尼斯曾提出著名的媒介传播偏向论,即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伸的媒介。比如,石板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容易传承。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因而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讯息,然而他们传播的讯息却限于当下,比较短暂。<sup>[3]</sup>在伊尼斯的偏向论界定中报纸属于偏向空间的媒介,由于报纸的材质为较薄的纸张,相对于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更便于折叠存放,也有利于报纸的重复传阅,同时更有利于空间上的运输和携带,使报纸副刊能够突破空间的限制,提高副刊的覆盖范围。这正好印证了伊尼斯所述的报纸“偏倚空间”的特质。

第四,报纸具有双向传播模式,副刊成为公共言说的空间。不同于电视、广播、书籍等单向的传播模式,报刊的传播模式是双向的,报刊不仅为读者提供信息、传播知识与思想,也为作家提供一个公共言说的平台与空间。“报刊是国民的代表,特别是平民的代表。”<sup>[4]</sup>自由的沟通、表达、交流、讨论、商议等是报纸特有的功能,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报纸和受众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双向同构关系,报纸副刊的作用,最终是要通过受众的接受而实现的,读者是报纸最终价值的实现者。<sup>[5]</sup>而这种关系在副刊所呈现的文艺领域表现尤为明显,读者与报纸的互动大大推动了近代报刊的发展,如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大型文艺论争,基本上都通过报纸副刊这一媒介来实现读者与报纸的互动,进而向大众推介和展示的。因此,报纸的副刊是媒介参与文学的结果和呈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报纸这一传播媒介工具,同样报纸媒介反过来也对文学的形态和文体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副刊拥有较为独立的编辑形态。副刊拥有自己固定的版面,在它自己的小空间里又有着基本固定的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为主的文体,内容和形式上区别于新闻、评论。这是因为副刊在编辑上有相对独立的编辑群体,且副刊的文艺性、消闲性特质也使得副刊的内容较为松散和自由。而副刊所具有的这种独立编辑形态和其呈现出的相对宽松、兼收并包的舆论环境,使得副刊成为报纸之间竞争的有力武器。民国时期,很多国民党报刊上曾出现过与报纸正刊言论不太一致的进步副刊,如《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中央日报》的《平明》等,一方面是由于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副刊并拥有编辑主导权,另一方面是由于进步的言论和文艺受到人们的追捧,为扩大销路和提高言论版的影响力,国民党新闻当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一定范围内容许进步副刊的存在。但一般情况下,副刊“在根本上和所属报纸存在着统一性,曰新闻性的统一,曰类型格调的统一,曰基本立场的统一。”<sup>[6]</sup>副刊的编辑形态自由也只是相对的短暂的自由,一旦官方收紧言论,副刊同样开始谨言慎行,甚至成为官方话语的文艺宣传工具。

副刊因其依附的报刊媒介而具有的新闻传媒属性,使得副刊在编辑形式和内容上受报纸影响,但报纸所具有的快速、便捷、携带方便、便于运输、传播范围广、受众面大、双向互动以及独立编辑形态等特征,同样促进了副刊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 二、副刊的文艺属性

副刊自问世以来，就与文艺有着密切关系。副刊虽依附于报纸，以补充报纸的形式而存在，但其所呈现的主要还是具有休闲性、趣味性、可读性的文艺性作品。从副刊中可以品味到原汁原味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不同文人群体与流派的文艺论争，可以把握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窥见文艺理想与历史真实中的张力与纠葛。副刊与文艺相得益彰，副刊为文艺提供了“发声”的媒介与平台，文艺也赋予副刊浑厚的神韵，使副刊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副刊的灵魂能够摆渡到更高的层次。

首先，副刊呈现了原汁原味的文艺形态。副刊是对不同时期文艺图景的真实记录，它不仅展现出不同时期文学的百家争鸣形态，描摹文艺群体之间话语争夺的细节，勾勒性格鲜活的文人群像，最重要的是从副刊中能重读被历史遮蔽的原汁原味的文艺形态。《晨报副刊》被周作人称为“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sup>[7]</sup>尤其在五四时期，《晨报副刊》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晨报副刊》的主编历经李大钊、孙伏园、汤鹤逸、徐志摩等人，在当时已经有相当的影响。鲁迅、周作人、冰心、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胡适等都在《晨报副刊》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鲁迅的《阿Q正传》、冰心的《繁星》等都是最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并产生后续影响的。我们还可以通过《晨报副刊》窥见民国时期文人之间的微妙张力，孙伏园编辑《晨报副刊》侧重于新思想的传播，使副刊更具有思想性、时代性。而徐志摩编辑《晨报副刊》则使副刊更加注重感情色彩，使副刊带有浓得化不开的诗人般的气质。同一副刊的不同气质，不仅与主持副刊的主编的喜好有关，还与不同主编所属的文艺群体之间的话语诉求关系密切。这些文艺背后的故事可能都是文学史中极少涉及的。近代副刊中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原汁原味、未经雕琢、未被秩序化的“毛坯”作品，虽然有些作品稍显稚嫩、浅薄甚至不成熟，但是呈现的大多数都是未经筛选的文人创作时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感受，文人之间的嬉笑怒骂，平民的日常形态，以及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情状，为人们奉上了原汁原味的文学大餐，供人们细细品味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彩纷呈。

其次，副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源地。副刊是文学与现代传媒的结合物，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源地。著名作家沈从文曾这样说，“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泰戈尔、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出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须由副刊找机会。”<sup>[8]</sup>近代中国处于时代大变革之中，知识分子具有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报纸副刊作为当时重要的文学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输送文学的形式来实现社会功能，使得副刊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源地。现当代文学中很多重要的作品和历史故事我们都能从报纸的副刊找到源头，例如鲁迅的杂文《阿Q正传》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沈从文的短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最早发表在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刊》上，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最早是在1930年的《新闻报》上连载，郭沫若的五幕史剧《屈原》于1942年1月24日发表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副刊上，这些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最初均是在副刊上发表作品。此外，很多人肩负文学家与报人的双重身份，不仅在副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同时也担任报刊的编辑或主笔，如张恨水担任过《皖江报》《世界日报》《立报》的编辑或主笔；徐志摩在北京主编过《晨报》副刊《诗镌》，创办《新月》杂志、《诗刊》季刊；沈从文主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他们在生产文学作品之余也创造更多开放的文艺空间来容纳多元、丰富的文艺思想，使文学与媒介形



成良好的互动,促进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反过来,正是由于有源源不断的作家在副刊上发表作品,才使得副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日益扩大,成为不可忽视的文艺力量。文学和副刊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我国现当代文学和近代报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副刊上的文艺作品通过报纸的传播与推广迅速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滋养血液,从更深层面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 三、副刊的社会属性

副刊除了自身内部的媒介属性和文学属性之外,其与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副刊不仅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情状做积极的反映与呈现,也对同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副刊又是嵌入社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副刊与社会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共同发展,从副刊的发展可以窥见到整个社会文化的缩影。此外,副刊对社会历史的记忆和文化遗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

首先,副刊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镜像。副刊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于新闻和评论对国家、政治等宏观层面的记录,副刊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情状和国民心理变迁的反映。而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态又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媒介形态。媒介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呈现不同的面貌。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副刊一般呈现相对活跃、自由且多样化发展的态势;而逐渐趋紧的社会文化环境,则使得副刊的言论也逐渐收紧,且注重政治宣传效果,其文艺的特性逐渐向政治话语让渡。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媒介传播手段的进步以及人们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报纸副刊也会改变以往的面貌,内容不再局限于文艺性相关的作品之中,而是开始涉及到旅游、时尚、购物、彩票、体育等各种专刊、特刊等。副刊的分类更加细化,涉及面更广,形成了大副刊的发展趋势。这都是副刊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自我调整。因此,副刊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反映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特色,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发展状况和思想价值取向。

副刊媒介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反映和呈现,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副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得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涌入中国,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形成巨大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导致整个社会心理的变迁。其提倡的白话文、新式标点等传播手段对副刊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离不开报纸副刊的巨大推动作用。新思想、新文化借助报刊媒介,大大拓展了其传播的文化空间,使文化在不同的时空得到迅速的延展。同时,其价值观念也开始逐渐向不同的受众群体渗透,读者群也由过去的洋场才子、斗方名士等转向知识青年,尤其是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这一部分群体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五四时期的副刊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一时期副刊的繁荣我们可以窥见到整个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此外,副刊也为大量的文人作家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公共平台和交流空间,就如沈从文所称,“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报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sup>[9]</sup>

其次,副刊是一种嵌入社会的媒介。副刊作为记载、传播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发展情状的媒介,不仅仅是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情状的“再现”,同时副刊还嵌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具体化、情景化的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副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已经嵌入到社会之中,副刊本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从嵌入性视角下去重新认识副刊媒介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副刊媒介是观察社会尤其是文化发展的窗口。副刊作为嵌入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呈现的大多是

与社会现实相贴近的文化信息。因此，副刊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性”文化信息的重要展示平台。与此同时，副刊的内容大多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和国民心态变迁，涉及到国民情感关系的呈现，容易引发读者在情感上的共鸣。而这种共鸣又有助于副刊更好地嵌入社会，适应社会格局的变化，最终实现其价值追求。有学者在论述媒介与社会关系时指出，“媒介和社会关系都是为满足人的发展需求提供必要条件，信息传播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的重要工具与动力之一，社会关系的变革则能促使媒体持续发展。所以，媒介伴随技术、文化的发展和人类关系的需要而发展，自由度和需求满足弹性不断上升；社会关系也因媒介发展而不断重构、重组，日益细致，多面分化，呈立体状态。”<sup>[10]</sup>这段话阐释的是媒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副刊作为报刊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媒介形态，努力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副刊媒介与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陈平原也曾就大众传媒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展开讨论，他认为“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sup>[11]</sup>同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副刊所依附的报刊传媒不仅仅是呈现社会文化发展情状的工具，而且是已经深深嵌入到社会文化之中，深刻“入侵”到社会文化肌理层面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浓缩了社会发展的图景，由副刊媒介就可知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全貌，离不开对当时报纸副刊媒介的深入挖掘和立体分析。

最后，副刊是对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渗透，机械复制不仅体现在文字、图像的反复印刷方面，整个世界都在技术的规范下不断复制，出现标准化、一体化倾向。语言和文化作为区分不同文明特色的重要介质，也在世界同质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被同化与消解的危险。因此，我们需要尽量规避技术带来的风险，利用技术来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建构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历史记忆是我们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它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它记载来获得的，或者说，历史记忆就是现存的文献可以考察确定，在历史长河中确有其事其物的历史。<sup>[12]</sup>文艺副刊作为历史上很长时期的大众媒介之一，拥有用文字和图像来书写和记忆文化的独特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重拾历史记忆碎片的窗口，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想象和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副刊作为记录和传播时代文化、社会情状的重要载体，其记录功能为后人留下了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副刊的传播功能使副刊上的文艺作品得到大范围的扩散，然而，传播只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和广泛集合体中的片段，而这个广泛的集合体，我们将称之为传承。<sup>[13]</sup>因此，传播代表着特定时间内的信息流通，偏向于空间概念；而传承则是建立在传播的基础之上，在长时间内传递信息，传承包括所有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偏重于时间概念。可以说，传承是传播的延续。因此，副刊不仅仅是记录、传播文化的载体，通过副刊这一传播媒介还实现了对文化的传承与“坚持”，更蕴含着对未来的期许。

#### 四、结 语

关于报纸正刊与副刊的关系，中国著名报人黄天鹏曾把它生动形象地比喻为“主妇与恋人”的关系。<sup>[14]</sup>总的来说，副刊是具有相对独立性、文艺性、趣味性、思想性以及时代感，且拥有固定的刊名、版面和出版周期的传播媒介，为人们提供理论、思想、知识、文化和各种实用生活信息等多样性内容。

它融报学和文学特征于一体，以报刊的形式传播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是报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副刊媒介的发展脉络与社会文化发展变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一直以来人们多关注副刊的媒介属性和文学属性，而忽视了其社会属性。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即社会”。而副刊媒介与社会文化出现融合和互渗的发展态势，也即副刊既是社会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史的缩影。

#### 参考文献：

- [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200.
- [2] [加拿大]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 [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
- [3] [加拿大] 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 [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3.
- [4]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142.
- [5] 徐芳. 中国报纸副刊的逻辑始点及现状点击 [J]. 新闻大学，2002（1）.
- [6] 冯并. 中国文艺副刊史 [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2.
- [7] 钟叔河. 周作人文选（1930-1936）[M]. 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332.
- [8]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6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47-448.
- [9]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2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204.
- [10] 孟盈. 论媒介与社会关系在发展中的交互促进 [J]. 复旦学报，2010（4）.
- [11] 陈平原.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
- [12] 何扬鸣. 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 [D]. 杭州：浙江大学，2013.
- [13] [法]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 [M]. 刘文玲，陈卫星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
- [14] 黄天鹏. 新闻文学概论 [M]. 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0：217.

[责任编辑：詹小路]